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

何 畏

内容提要 “不忘初心”,成为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保证。在面对改革的“硬骨头”“深水区”时,有的人以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为名,模糊、排挤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本体,用新自由主义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的人面对过大的收入差距、严重的不正之风,以教条主义态度反对改革,用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公式反对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原则、方法和任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体现了历史本体论与实践创造论的辩证统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方法论。

关键词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社会本体论 实践创造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何 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10016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2100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何去何从牵动着中国人民的信仰和信念的神经。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在同顽固的教条主义、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坚决斗争的新起点上进行的。“不忘初心”,始终成为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保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常有人在解放思想时,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原则和底线,在面对改革的“硬骨头”“深水区”时,以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为名,模糊、排挤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本体,用新自由主义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有人面对过大的收入差距、严重的不正之风,以教条主义态度反对改革,用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公式反对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历史本体论与实践创造论辩证统一的视角,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根本方法论,成为党在新形势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J20160081)和全国学校共青团课题(2015ZL04)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历史本体论和实践创造论意义

“初心”，即起点之心，它是社会实践主体进行重大历史活动或重大社会选择时的信仰选择、理想设定、政治承诺和立业之志，是这个实践主体创造历史的根据和本体。一个政党的“初心”，就是建党时对自身理论信仰、性质宗旨、历史使命、奋斗目标的选择、定位和承诺。

崇高信仰、远大理想，是成就历史大业的思想前提和精神保证。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政党、国家，没有对根本目的、远大目标的理想执着，没有对作为对支撑理想目标的科学理论的坚定信仰，都不能成就大业。但凡成就大业和持续辉煌者，皆以不忘初心为根本。佛教徒为了修道成佛而坚信：“三世一切诸如来，靡不护念初发心。”^[1]在佛家看来，成佛的奥秘在于守护好“初发心”，即时刻护念踏进佛门之始心中所秉持的那颗成佛利生之心，那份真诚质朴的求法向道的志愿。宗教信仰如此，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一个政党，只有始终牢记、敬畏自己建党时的理论信仰、理想使命和政治承诺，才能始终保持“永远在赶考路上”的进取状态、谨慎之心和政治本色，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永不迷向。

社会历史特定主体的“初心”，是其创造历史的观念前提，是其创造物的观念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初心”具有历史本体论地位。“社会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的根本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特定观念引导下对自然存在物的形态或本质的改变，人的实践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本质是对象性，即人把自己的目的植入实践对象，马克思对蜘蛛、蜜蜂的活动和工匠的劳动的差别做了这样的比较，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工程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实践结果像一面镜子，映现着人的本质，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所以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

正是“初心”成了人类重大实践活动的初始目的、远大目标和理性意志，具体化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根据和蓝图，这恰恰是人的活动的计划性、预见性、能动性的最鲜明表现。特定社会历史主体的“初心”是其“继续前进”的创造根据和持续动力。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5]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通过扬弃目的的客观前提的直接性而在对象中实现目的。黑格尔论证道：“目的的运动可以这样来表述，即运动的进行是要扬弃目的的前提，也就是要扬弃客体的直接性，并且要建立由概念而规定的那样的客体。对客体这样否定的对待，也同样是对自身的否定的对待，也就是目的的主观性的扬弃。”^[6]作为过程的初始图式并规定着过程观念，目的志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因而它“自身即是一种扬弃或主动的力量，它能够否定这种对立而赢得它与它自己的统一，这就是目的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目的转入它的主观性的对方，

[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第2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2页。

而客观化它自己,进而扬弃主客观的差别”^[1]。

特定社会历史主体忘记“初心”将导致主体和事业的双重变质。“初心”一方面自我规定着“我是谁”,忘记“初心”就放弃了对自己性质的契约性规约,导致变心变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变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非无产阶级政党,由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蜕变为平庸的、利己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初心”规定着“我要到哪里去”,忘记“初心”就是放弃对自己的理想使命的政治承诺,改旗易帜,背离当初选定的社会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避免走弯路,就要将反思党及其事业的本质设定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实践的全过程。对“初心”的反思是一种历史思维,或曰历史本体论思维,就是人对自身及其相关事物的本原、本质、根本目的的持续追问,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时刻提醒自己“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如果在“我是谁”的认知上出现偏差,将会在“我到哪里去”的过程中出现颠覆性错误。正是反思初心、“不忘初心”才保证特定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和理念预设的战略定力,奠定着“继续前进”的观念根基,明示开拓创新的根本方向,唯其如此,自身才能成其强,事业才能成其大,并不断趋近于远大理想目标。所以习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3]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本体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本体和全部实践的价值所向。“不忘初心”,最本质的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牢记中国共产党是谁?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4]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给予共产党人的是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使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不合理的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就是因为它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就变质了,即使它还叫共产党,也已名存实亡。

一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忘记甚至否定“初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危险。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一句话,他们背离了自己的政治誓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甚至走向了对立面。“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习总书记甚至还作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

[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7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3]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

[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我们的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1]这是一个需要全党以实际行动持续作答的试题,时刻都在检验着每个党员的政治和道义水准。

有的学者甚至从“共产主义”概念的翻译上来消解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这一译法出自朱执信从日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世纪50年代翻译家许渊冲提出,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德文“Kommunismus”译为“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原意中没有“共产”只有“共同”的意思,应当翻译为“共同主义”。最近又有学者把这一观点翻了出来,企图从理论源头上消解共产主义信仰提供文本佐证。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的翻译主张。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再到《共产党宣言》,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3],通过消灭私有制来使“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平等和自由,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4]。因而“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5]。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说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6]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舍此,就无科学共产主义可言,将“Kommunismus”译为“共产主义”,最能表达马克思的理论本质,译为“共同主义”却无法表达科学共产主义宣言的目的和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批评费尔巴哈借助“共同人”来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荒谬性^[7]。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两个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当前遇到两大挑战:一方面有人以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有人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搞新自由主义置换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这两大挑战都会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面对各种挑战,习近平同志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了澄明。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实然性定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作出应然性要求,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8]后面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全党和全社会足够的重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个看似早已心知肚明的老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变得若明若暗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历史时刻,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五个主要方面的“决定意义的差别”,这就是: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415页。

[2][3][4][5][6]《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第45页,第53页,第66页,第47页。

[7]《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义社会过渡,等等^[1]。澄明这些原则,意在重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源头,表明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之根、未来前途和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信仰选择和奋斗目标定向,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决不是书斋中的理性玄想和观念建构,也不是善良意志的价值偏好,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现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物的价值颠倒,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论证了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主宰历史、享有历史进步成果的历史公正性、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为此坚持实现解放人民、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从而既占据了“理论制高点”,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2]。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反对教条式地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置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最本质、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理论逻辑”,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对于实践主体所具有的应然性或“应该如此”的张力,遵守“理论逻辑”是社会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根本形式;“历史逻辑”是社会历史条件对实践主体实现理想的内容、程度、方式的“必然性”制约,使特定的实践主体“只能如此”;当“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辩证统一于具体实践中时,才能保证科学理论成为兑现主体理想根据,如果不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如果不顾中国社会发展条件形成的“历史逻辑”,又会陷入教条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同时并存的突出问题表明,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与生产力现代化水平现出了新的不适应。改革开放之初,党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时,是基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现实,不断调整过去被人为拔高的、超越生产力实际水平的生产关系,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该如何判断和要求?我们不妨这样思考:党确立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关系维度上也应当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还有30多年,这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调整将是一个艰巨任务。我们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分配

[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制定了现代物权制度;借力世界经济、适应WTO规则,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告别安贫乐道与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为创造和积累财富注入观念动力。应当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是这些改革的结果。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回避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严重存在,已经暴露了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新的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严重不足。比如,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跨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可是,我们的贫困人口截止到2015年底,仅农村就还有大约6000万,而且我们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800元的低水平;我们的一些发达城市已经步入高度现代化水平,可我们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前现代化水平。当前的产能过剩和大量库存,也是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的集中暴露。比如房地产库存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近7亿平方米,与此并存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家庭不能安居,据2016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772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01万套,农村危房改造432万户,总计1805万套(户),按每套(户)60平方米计算,约为10.83亿平方米,远远超过现有商品房库存,也就是说,相对于住房刚需而言,待售商品房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实际上是虚假库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如此大量的“棚户区”“危房”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极为不相称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更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未来也不会走劫富济贫之路,但是,毕竟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的先富后富只能是“差别适度”原则,否则就是普遍的两极分化了。大量有需求而无支付能力人群的存在,是产品过剩的根本原因,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是解决市场产品过剩的根本出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有局限的,它自然趋向高经济效益而未必是高社会效益;而且市场经济对企业的优胜劣汰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既体现在普通劳动者身上,也体现在企业主和各类市场主体上。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劳动和积累财富的动力,但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造成劳动者的消极态度和社会怨恨,也会造成消费畸型和商品过剩,使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可持续性中断。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经济社会体制,是任何市场体制的国家都必然面对的课题和难题。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双向并轨”的大思路,他说:“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1]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集体,认为“扩大中等收入集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个核心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2015年习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指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推进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公平公正,逐步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一是在长板与短板的关系上,我们要扬长补短。贫困人口的存在和严重民生问题,是我们的最大短板。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小康,是所有人、所有地区“一个不能落”的小康,我们必须通过“十三五”的奋斗,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让他们与所有人一起步入全面小康。二是在基本需求与高层次需求的关系上,我们要保住基本与提升层次并举,首先是保基本。通过健全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全体人民都过上体面的、尊严的生活。三是在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上,我们必须在富裕的进程中不断缩小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但是,不断缩小差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追求。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础。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在全部生产要素中的收入分配比重,抵制过高收入,另一方面,提倡和促进民营企业回报社会,理直气壮地对非公有经济讲清两点:其一,我国的非公有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其二,非公有经济的巨大资本和利润,主要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观点。非公有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经济人士要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1]。

在生产关系方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在生产力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困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要实现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出的,需要经历无数个历史的“中间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连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只有“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这其中必然经历曲折迂回,但总的趋势是绝对不容否定的。如果说,过去我们要摆脱教条主义,解放思想,从“极左”思维方式中走出来,那现在,我们就要重温“初心”,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由注重“中国特色”到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本体,它预示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4]。

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根据变化着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具体地处理好“不忘初心”与“继续前进”的辩证关系,是保证这一伟大斗争成功的根本方法论。

[责任编辑:曾逸文]

[1]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